

问道 田野与文献

Asked the
field and literature

——云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赵玉中◎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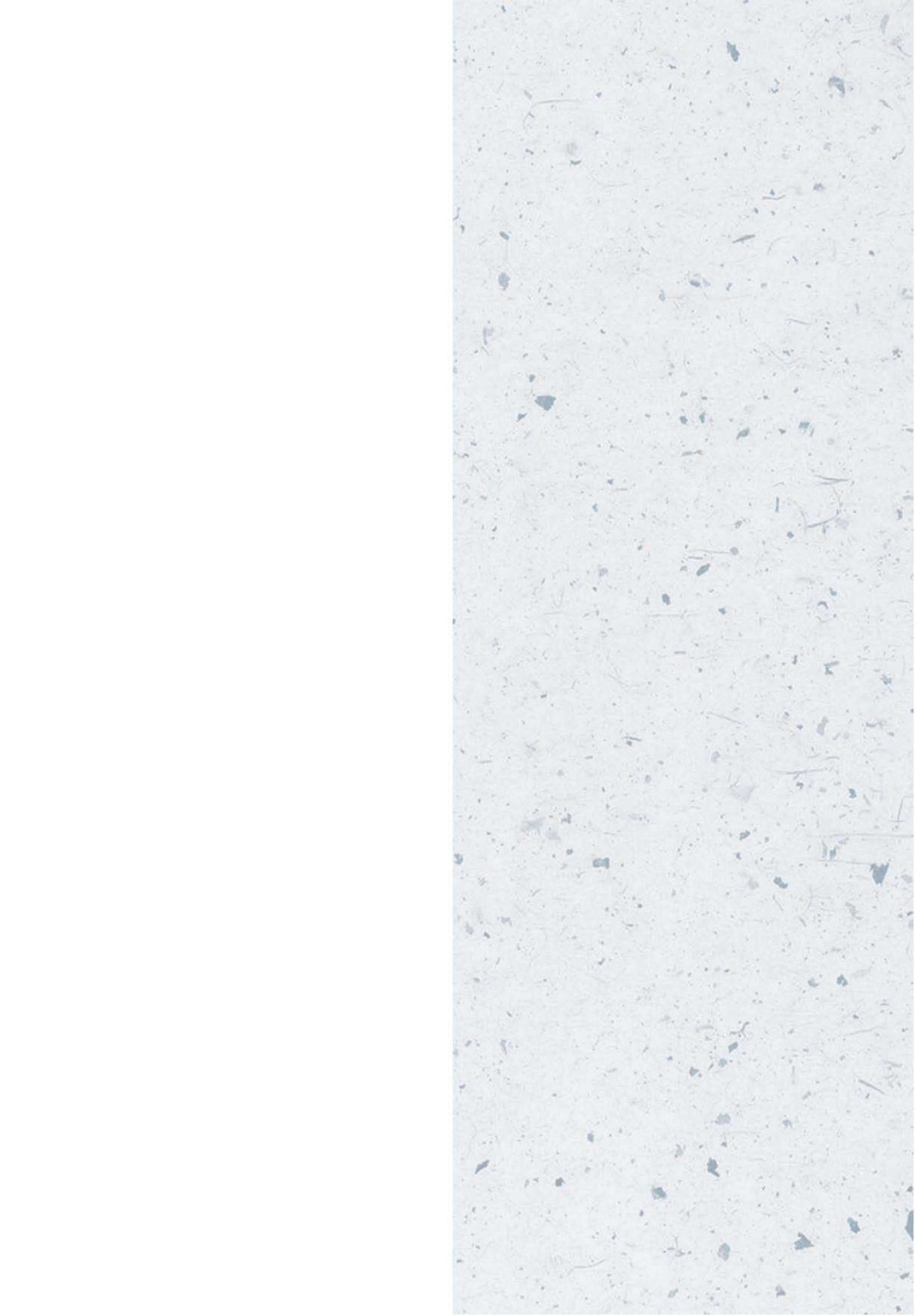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Yunnan Nationality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赵玉中，1969年生，云南大理喜洲人。英美语言文学专业学士、硕士，民族学专业博士，副教授。现任教于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主要从事云南社会历史文化的人类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及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主持及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科研项目。



问道田野与文献

——云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ISBN 978-7-5482-2939-1



定价：50.00元

问道—— 田野与文献

——以《礼记·礼运》为研究对象的田野调查

田海平



本著作得到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问道 田野与文献

——云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赵玉中◎著



Learning in Field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Ethnic Histories and Cultures in Yunnan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问道田野与文献: 云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 赵玉中
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482-2939-1

I. ①问… II. ①赵… III. ①文化史—云南—文集
IV. ①K29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5544 号

策划编辑: 邓立木
责任编辑: 石 可
装帧设计: 贺 涛

问道
田野与文献
——云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赵玉中◎著

Learning in Field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Ethnic Histories and Cultures in Yunnan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90 千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939-1
定 价: 50.00 元

地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 182 号 (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0 65033244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目 录

学术探讨	1
大理洱海地区的祖源叙事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3
身份之辩：大理“西镇”的祖先叙事	13
祖源记忆：社会情境与民族认同	
——《大理喜洲翔龙村张氏族谱》的个案研究	25
民族文化的“本质化”建构	
——以白族知识精英有关“本主”崇拜的学术书写为例	34
地方风俗的诠释和建构	
——以大理白族“绕三灵”仪式中的“架尼”为例	43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与地方社会	
——以云南大理白族“绕三灵”的申遗过程为例	50
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以大理白族“绕三灵”为例	60
云南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历史与现状	70
迈向实践的人类学	
——大理喜洲旅游人类学田野实验报告	94
家与国：清中期以来大理坝子民居空间的营造	111
社会边界的建构与重塑：大理白族本主崇拜的历史流变	131
学术评介	151
《象征的来历》书评	153

中心和边缘	
——海外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158
西方视野下的少数民族研究与文化	
——路易莎·谢恩和《少数人说了算》	167
许烺光：作为“边缘人”的人类学家	172
许烺光及其笔下的大理喜洲	178
流行文化、旅游业与“地方”的再造	
——美国人类学家那培思及其大理研究	182
美国学者史杰夫对大理白族宗教文化的调查与研究	188
日本学者横山广子的大理白族文化研究	193
学术随笔	197
人伦之轨模	
——大理喜洲赵府	199
由儒而商	
——喜洲“复春和”商号往事	202
读吾邑喜洲志乘偶感	206
“下关沱茶”与喜洲“永昌祥”商号	209
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园”与布朗族的超自然信仰	218
翻译与英文著述	227
对云南大理白族的表述与自我表述的再思考	229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tudies in Yunn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243
Bai Nationality	269
Remaking social bounda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benzhu worship in Southwest China	272
后 记	297

学术探讨

大理洱海地区的祖源叙事及其 社会文化意义^①

[摘 要] 大理洱海地区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层叠起“驳杂”的社会记忆与“歧异”的文化传统。这些记忆与传统一同成为居住于该地域空间中的“名家大姓”处理其身份叙事的历史文化资源。因应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他们的身份叙事大致呈现出在华/夷祖源之间“摇摆”的特点。不过，作为一种身份建构策略，祖源叙事与族群认同及其变迁之间并不存在结构性的对应关系。一个人群祖源叙事的改变亦并不必然使其获得新的族群身份。其祖源叙事的这种“摇摆”与地方和国家历史关系的复杂性有关，亦与处于华夏边缘的这一地域社会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内在建构方式有关。

伊佩霞 (Patricia Ebrey) 认为，“姓氏”是中国周边的非汉部落社会卷入“华夏我族”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媒介。^②王明珂亦认为，中国近代炎黄子孙的国族建构有其历史性的基础，许多中国非汉族群的统治家族及中国域内的中下层家族，往往透过“姓氏”的获得以及与此相扣连之始祖，攀附在以黄帝为祖源的系谱之上。^③他进而指出，宣称一个共同的起源就等于宣称一种新的族群认同。人群以共同族源来凝聚认同，而认同变迁又由改变族源来完成。因此，强调、修正

① 本文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99-104页，系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云南大理洱海地区民间文献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10BMZ037），及2011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大理洱海地区白族民间文献（墓志铭与族谱）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HZ2011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 Ebrey, Patricia. “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 in Melissa J. Brown, ed.,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11-36.

③ 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2002年第3期。

或虚构一个族源历史，对于任何人群都非常的重要。^①

不过，究竟祖源叙事与族群认同及其变迁之间是否如王明珂所言存在着结构性的对应关系？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拟结合对大理洱海地区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以元明以来的官方史志以及墓志铭与族谱等民间文献中的祖源叙事为分析对象，来进一步审视与检讨祖源叙事与人群身份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官方史志中“名家大姓”的身份流变

早在汉晋时期的汉文献记载中，滇中及滇西地区便已有杨、赵、李、董等“部曲大姓”。^②据《西洱河风土记》（648年），初唐时期，在今大理洱海地区一带，“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自云其先本汉人”，“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余种也”。^③依此，无论这些“名家”或“大姓”是否确为楚将“庄蹻”的遗裔，从其关于祖先来源的自述（即“当地人观点”）中不难发现，他们曾一度“攀附”在“华夏”的祖先系谱之上。

南诏兴起之后，杨、李、赵、董等“大姓”或“名家”却在中原文献的记载中被“贬”为了“蛮”。如，《蛮书》（863年）称：“蒙舍，一诏也……姓蒙，贞元年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又，“越析诏，有豪族张寻求”，“青岭蛮，有首领尹氏父子兄弟”，及“渠敛蛮，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④尽管南诏蒙氏与杨、赵、李、董等“名家大姓”的来源可能有所不同，因他们行“父子连名制”，且在历史文献中多被列为“乌蛮”，与被称为“白蛮”的“名家大姓”似为不同分类的族群，但在南诏奉使到唐朝时，却抬出了与“庄蹻”相对抗的土著始祖——“沙壹”。

不过，南诏、大理国贵族阶层的主体则是杨、李、赵、董等“河蛮”大姓。^⑤连瑞枝因此认为，这一祖源叙事的重大变化是因为南诏地方王权的建立改变了当地“名家大姓”的“汉人”祖先认同，使得一度具有部落阶层性意义的“汉人姓氏”成为了南诏王权统治贵族的符号。^⑥

①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3-54页。

② 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4），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357页。

③ 梁建芳：《西洱河风土记》，//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8页。

④ 樊绰：《蛮书》，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翻印，1998年，第9-35页。

⑤ 张旭：《大理白族史探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1-101页。

⑥ 连瑞枝：《姓氏与祖先——云南洱海地区阶序社会的形成》，《历史人类学学刊》2006年第2期，第1-36页。

蒙古人征服大理之后遂在洱海地区设立了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此时，大理国王室段氏在元王朝的官僚体制中已被降格为“土司”。尽管如此，在元人的记述中，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此时已被洗清了“蛮”的“污名”：“白人，有姓氏。……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①从此寥寥数语之中，我们虽并不十分清楚为何“今转为白人”，也不明白“白人”与“僰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但至少可以明确的是，在中原文人看来，“白人”仍是一个有别于“汉人”的群体。

1382年，明朝征服大理之后便彻底地废除了元朝世袭大理总管段氏的土职，在洱海地区设立了流官知府，并开始登记里甲与编户。其中，太和县“编户六十六里”。^②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也从此成为了明中央王朝的“编户齐民”。

“民籍”的取得，意味着“名家大姓”与中央王朝之间确立了新型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身份转变之后，他们遂纳粮当差，参加科举，并渐次进入明王朝的官僚体系，成为明王朝进一步控制、征服与统治云南的重要依赖对象。即便如此，此后的官方史志仍一直将其视为一个有别于“汉人”的群体。如，据天启《滇志》：“白人，古白国之支流也。旧讹僰为‘白’，遂称其一类，实不相通。滇郡及迤西诸郡，强半有之。习俗与华人不甚远，上者能读书，其他力田务本，或服役公府，庶几一变至道者矣。”^③此后的官方史志大体沿袭了《滇志》的记述，均将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记为“白人”。^④即便在“美雨欧风东来，大陆斯拉盎格窥伺中原”之际，地方志的纂修者在呼吁黄帝子孙不能再有“种族思想”的同时，仍不忘将“近今亦寥若晨星”的“我邑土著”——“民家子”记述为“白国之后，即滇中之土著”。^⑤而元明以来洱海地区周围府县的地方史志则认为他们是

-
- ① 李京：《云南志略》，//郭松年、李京：《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王叔武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6-96页。
- ② 李贤：《明一统志》，//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7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1页。
- ③ 刘文征：《滇志》，//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7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 ④ 在大理洱海地区的民间传说中，南诏建立之前，洱海地区的南部白崖一带曾有“白国”。后来，白王张乐进求禅位于南诏蒙氏。而元末明初之后的地方野史，如《白古通记》、诸本《南诏野史》及清初的《白国因由》等书，则将南诏、大理国等地方王权的历史逐渐抽象为“白国”或“白子国”。笔者认为，明朝大理地方文人及民间对于洱海地区“白国”王权历史的强烈记忆，可能是天启《滇志》及之后的官修志书将“名家大姓”视为“白人”或“滇中之土著”的主要原因。
- ⑤ 周宗麟等：《大理县志稿》（卷三·三三至三五），1916年（1991年大理市大理图书馆翻印本）。

“中土”移民之后，因“世远俗移”而“非华非夷，自成一类”，^①或因其所操之“彝语”而认为是“以彝从汉”。^②显然，在其周围群体看来，“名家大姓”的族群身份显得十分的模棱两可。

二、元明以来“名家大姓”的祖源叙事

尽管在元明以来的官方史志中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总体上一直被视作一个有别于“汉人”的群体，但他们自己对其祖先来源的“自述”却与官方史志对其族群身份的分类与描述有着极大的不同。

据出土于大理五华楼遗址、撰于元至正年间的《故理阳寨长官司案牍段璉墓铭并序》：“案牍姓段氏，讳璉，考其世系源流乃□（楚）庄躄之□□将官也。威王使躄伐滇，既克，会秦灭楚，躄遂留王滇池，以其众分为五将，而已总以统之，因成一□□□之属，段氏其一也。”^③显然，唐文献记载中的“河蛮大姓”此时再次经由“庄躄”这一中原文化符号“攀附”到了“华夏”的祖先系谱之上。及至明初，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则已毫无例外地籍其“姓氏”的地望（如“清河张”“弘农杨”等）将其祖源溯至中原。如，据明宣德元年的《故居士张公墓志铭》：“张之得姓，肇自清河，……其先自蒙以来，相与辅弼，克底于治，授文职，授武爵，枝分派别，莫可缕记。”^④

然而，约在1440年代至1500年间，“名家大姓”的祖源叙事却发生了极大的逆转，他们要么声称自己是云南本地的土著——“九龙（隆）族之裔”，要么宣称其祖先源自西天竺的“婆罗门种族”。如，据明景泰二年的《故考大阿拶哩段公墓志铭》：“夫西竺有姓名曰阿拶哩，是昆卢遮耶族，姓婆罗门，从梵天口中生，教习秘密大道。唐贞观己丑年，观音大士自乾竺来，率领段道超、杨法律等二十五姓之僧伦，开化此方，流传密印，译咒翻经，上以阴翊王度，下以福祐人民。迨至南诏蒙氏奇王之朝，大兴密教，封赠法号，开建五密坛场，为君之师。”^⑤

约在1500年之后，洱海地区已鲜有“九（龙）隆族之裔”或“婆罗门种族”的祖源叙事。不过，在当地的读书人中间却仍普遍地流传着许多“云南地处

① 佟镇：《康熙鹤庆县志》，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翻印本，1983年，第67页。

② 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7页。

③ 张旭：《大理白族史探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1-101页。

④ 大理市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大理古碑存文录》，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97-99页。

⑤ 石钟健：《滇西考古报考》，//赵寅松：《白族文化研究2003》，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90-131页。

古天竺”及“苍洱之间妙香城”的说法。这些传说虽颇为荒诞无稽,^①但在明清以来大理的地方文献中却有着非常详细的记载。如,嘉靖丙戌进士、大理人李元阳就曾引经据典地证明“点苍山即为释迦说《法华经》的灵鹫山”。^②又,清初云南姚安府土同知高爵映亦在其编纂的《鸡足山志》中宣称:“书此以明西南夷之通西域,自西迤而上,均在南天竺之摩揭陀国中,咸受天竺之教化明矣。”^③在明末,大理士大夫编纂的地方志甚至还将当地人视作“印度阿育王的后裔”。^④

洱海地区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层叠起来的这类“歧异”的祖源叙事曾给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从事“白族”族源研究的学者造成了极大的困难。1956 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前后,云南学术界曾对白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展开过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云南日报》刊载了若干篇相关的论文。据任方就这些论文所做的综述,关于白族的起源,历史上曾流行过四种说法,即“傣族说”^⑤、“印度阿育王之后说”、“羌族说”和“汉族说”。不过,在这场争论中,前二说虽先后被否定,但仍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方国瑜坚持认为,白族乃以汉人为主的多种种族的融合,但马曜等白族学者则倾向于单方面地强调白族的“本土”起源,提出“土著说”。^⑥

三、元明以来大理洱海地区的儒家化进程

如前述,在元至明初的墓志铭中,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或通过“庄蹻”,或籍其姓氏的地望重新将其祖源溯至中原地区。这一祖源叙事的转变,显然与元明以来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推动的儒家化的进程有关。特别是在明朝征服大理之后,便着手彻底瓦解了段氏在大理洱海地区的统治基础。在将段氏遗裔迁出云南的同时,还将一批僧侣贵族世家拘押到南京。为进一步稳定在云南的统治,宣德

① 马长寿亦认为,若照《南诏野史》的说法,则云南的白族、彝族、西藏的吐蕃、中国各地的汉人都是印度阿育王的子孙了。参见马长寿《辟所谓‘西藏种族论’并驳斥经史内所流传的藏族起源于印度之谬论》,//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36-352 页。

② 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卷 2),大理:大理州文化局翻印本,1983 年。

③ 高爵映:《鸡足山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62 页。

④ 艾自修:《重修邓川州志》,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翻印本,1983 年,第 9 页。

⑤ 白族“傣(泰)族起源说”并非当地人的观点,而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建构的理论。对于“南诏是泰族王国”这一错误理论,早在 1930 年代就受到我国学者的批评。参见林超民《译者序》,/[美]查尔斯·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林超民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⑥ 任方:《关于白族起源的争论》,//杨堃:《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181-187 页。

间明王朝还将大理府的阿叱力僧与朵兮薄纳入王朝的行政管理体制，设阿叱力都纲副都纲各一人，朵兮薄都纪副都纪各一人，^①对大理段氏统治所依赖的僧侣教养阶层进行分化、打压、收编与利用。与此同时，在洱海地区建立流官知府，并对当地居民进行里甲登记与编户。随着大量的江南移民进入洱海地区屯田与戍守，明王朝还大力兴建学校与庙宇（如文庙、武庙与城隍庙等），令乡村基层设里社，全面推广儒学教育与王朝礼仪。永乐间，明王朝开始在云南开科取士。至景泰间，大理府“郡中之民，少工商而多士类，悦习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其登黄甲跻华要者今相属焉”。^②

及至正德间，明王朝的文化政策又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洱海地区此前曾被授以官职的密僧世家，此时已被明王朝视为“假托事佛祈禳，召集良家女妇宣淫坏俗”的罪魁，从而遭到极其严厉的打击。^③此后，南诏、大理国以来的僧侣贵族世家便不得不放弃“秘密教”的祖业，转向“文质彬彬”的“儒业”。特别是在“大议礼”之后，嘉靖皇帝在更大规模地打击“淫祠”与佛教的基础上，修改了明朝的礼制。诏令拆毁庙宇和寺观，没收其田产，兴办社学，提倡乡约，改良社祭，以在基层社会中推广儒家的正统礼仪。^④在践行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王朝礼仪的过程中，“名家大姓”开始“有意”抹杀此前家族铭文中蒙、段时期的祖源记忆，转而提及其家族祖先自元明以来的科举功名或所担任的官职，并在此时撰写的墓志铭与编纂的族谱中，明确地将其祖源溯至“江南”。^⑤

如，李元阳在其撰写的《给事中弘山杨士云墓表》中，仅将喜洲杨氏的始祖溯至元时的“邓川州同知”。类似地，李選在其撰写的《侍御中溪李元阳行状》中亦称：“先生讳元阳，字仁甫。世居点苍山十八溪之中，因号中溪。其先浙之钱塘人。祖讳顺者，侍元，为大理路主事。爱恋山水，遂家焉。”^⑥蒙、段时期的家族历史在明中后期“名家大姓”的祖源叙事中似一度成为禁忌。

诚然，祖源叙事的这一结构性变化凸显了“名家大姓”由崇“佛”到尊

① 黄元治：《康熙大理府志》（卷10），大理严镇圭重印本，1940年。

② 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80页。

③ 佚名：《明实录云南事迹纂要》，//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1-513页。

④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9-124页。

⑤ 赵玉中：《祖源记忆：社会情境与族群认同——〈大理喜洲翔龙村张氏族谱〉的个案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第23-27页。

⑥ 黄元治：《康熙大理府志》（卷29），大理严镇圭重印本，1940年。